

风雨人生路

FENGYURENSHENG LU

夏光亚 著

解放军出版社



风 雨

夏光亚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京新登字 117 号

书 名: 风雨人生路

著 者: 夏光亚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者: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 张: 10.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

统一书号: 55065·2443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1)
一、我的身世	(1)
二、投奔革命	(4)
三、入党	(9)
四、皖南事变	(13)
第二章 苏中斗争	(18)
一、投身基层	(18)
二、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日子里	(22)
第三章 进军苏、浙、皖	(38)
一、南下	(38)
二、反“顽”斗争	(44)
第四章 组建野战军	(70)
第五章 打败精锐师	(89)
一、海安战斗	(99)
二、李堡战斗	(101)
三、七十四师的覆灭	(108)
第六章 豫东战役	(122)
第七章 决战淮海	(147)
第八章 大战宁沪杭	(192)

一、打过长江去	(192)
二、战上海	(205)
三、在粟裕的领导下	(211)
第九章 感化俘虏	(220)
一、天下穷人是一家	(220)
二、官兵胜似亲兄弟	(226)
三、论功行赏,量才录用	(231)
第十章 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	(236)
一、在苏南茅山地区打埋伏	(236)
二、为了掩护医院,去做群众工作	(242)
三、两次负伤	(243)
第十一章 朝鲜战争前后	(250)
一、丁字山首战告捷	(256)
二、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前沿	(259)
三、参加夏季攻势作战,迫使美帝签订 停战协定	(261)
第十二章 学习刘英俊	(281)
第十三章 在军委支左办公室的日子	(288)
第十四章 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307)
第十五章 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312)
结束语	(329)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一、我的身世

我叫夏光亚,江苏泰州人,一九二一年生。一九三九年二月参加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入伍,一九三九年十月参加共产党。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

据泰州市地方志记载,“曾祖父夏荃(一七九三年——一八四二年)字文若,号退庵,泰州人。十七岁即入学,但不喜欢八股文,经年不作时论,学使来考勉强应付,省试多托病不赴。清道光五年(一八二五年)大病一场,从此绝意科名,一生只做过江苏丰县和湖北桃源县训导。退居返乡后专事纂述,与刘宝楠、刘文淇、吴熙载交谊厚笃,时有唱和,著有《晋砖唐石斋诗文存》传世……”夏荃生平嗜好古金石文字,“断垣残础,罗掘殆遍。”因寻访到晋砖及唐宋墓志,遂将书斋命名“宋石斋”、“晋砖唐石斋”。又醉心研究古钱币,纂有《退庵钱谱》八卷,汇录自

秦汉至明清古钱,并在编首著《历代钱谱考》与《历代年号重袭考》,征引考证严谨精审,订正前人错误不少。

夏荃搜集整理乡邦文献不遗余力,著有《退庵笔记》十六卷及《宋石斋笔谈》、《六客之庐笔谈》各一卷,罗掘自汉至清泰州的掌故逸闻,对史乘之失作了可贵的补充。又从多种古籍中辑录有关泰州的记载,编成《梓里归闻》八卷。夏荃还用数十年精力编纂了《海陵文征》、《海陵诗征》、《辟蠹山房丛书》,保存了很多自唐至清泰州人的诗文、著作。

据我母亲谈,曾祖父自幼丧父,靠母亲以女红为生,抚养曾祖父成长。曾祖父为她请清皇朝批准建了贞节牌坊一座,建了祠堂。曾祖父是文人,遗留十二三间房屋,十几亩地。

祖父夏庭熙曾当过董事,据我母亲讲,她嫁给夏家时,家已没落,田地也卖完,祖父生病,无钱治病,她把陪嫁首饰拿去做抵押,换来的钱为祖父治病。家产只有曾祖父留下的十二三间房子。

祖父生有三子二女。

父亲夏雨生、母亲夏陈氏。江苏苏州蚕桑师范毕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工业不可能发展,所学不能提供任职机会,基本上处于长期失业。曾在区公署、税所任过小职员。时间不长,生活贫困,常有断炊之难。我小学前,每天到祖母、外婆家吃中饭,中饭后带些米饭回家,解决一家的早晚饭。我是独子。在泰州市西

桥小学读学,高小毕业后,入时敏中学读初中一年级。经二伯父的介绍,父亲在上海《中华日报》任发行部主任。全家搬到上海,入上海私立正始中学读一年级。一九三三年五月父亲病故。母亲生活无着,返回故乡,当时,有父亲未死前留下的二百多元积蓄和伯父给她的路费、生活费,回乡后依靠自己的劳动,缝缝衣服,以及亲戚帮助维持生活。泰州解放后因年纪已大,劳动困难,政府每月补助大米十五斤,军队救济过几次。

父亲死后,二伯父找了正始中学的校长陈群,准予半费,住宿在学校读书。陈群思想反动,是蒋介石叛变革命、上海“四一二”事变中屠杀革命群众刽子手之一。他与二伯父私人关系不错。伯父也不要我到他家里去,一个人住在学校想父母,思想苦恼,半年学习成绩不好,两门功课不及格,被留级。伯父对我的态度更不好,搬家也不告诉我。每当开学时缴费、买书,我找他要钱缴学费、伙食费、书费,困难得很。我下决心好好读书,当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想读书救国,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都很好,一直维持读完高中一年级。在这样环境下,养成自己的性格内向,看到同学们开学时欢天喜地来到学校,路远的周六、周日都回家,而自己呢?孤身一人在校。但我不愿意将困难告诉母亲增加她的苦恼。在同学面前,总是感到低人一头,从来不愿意高谈阔论,但在思想上还是不甘落后的。

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纵容下,一

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军进行了轰轰烈烈淞沪抗战。在蒋介石破坏下失败了,有良知的人,觉醒了或开始觉醒了。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在我们党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推动下,北京爆发了一二·九的学生运动。抗日救亡的高潮在发展着,一浪高于一浪。陈群这个反共刽子手,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反共是一致的。每当有人从篱笆中将宣传品丢进来时,学校当局对此畏若蛇蝎,说这是共产党传单,立即收缴。但是教师们在上大课讲历史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大讲奸臣秦桧、严嵩等泾渭分明的故事;思想进步的教师,讲课中讲些日本侵略中国的动态等等,这些教员讲课共同的结论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走读生从市场上买回来邹韬奋等主办的宣传抗日刊物,带进学校,在学生中相互传阅。同学们也觉醒了,冲破了蒋介石的读书救国论,妄图把青年学生禁锢在书斋中的阴谋。我的抗战觉悟不断地提高,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加强了。

二、投奔革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揭开全国的抗战

序幕；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战爆发。此时，二伯父介绍我到他的朋友蒋光堂任经理的《神州日报》当练习生，每月生活费十元。我尽量的把钱寄给母亲。这个报社的背景是属于国民党于右任的，主张抗战。总编辑恽逸群是老的地下党员，常发表共产党人写的评论文章，诗人艾青经常投稿，销路很好。尔后，找了一个美国人当报纸的发行人，便于在上海租界中生存。因政治空气浓厚，我接触了大量的进步思想。报馆电话接线生许斌章，年龄比我大两岁，思想进步，懂不少革命道理，晚上经常同我谈共产党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抗战靠谁领导等等，最后，他告诉我准备到延安去，参加八路军。我说我也跟他去。就写信给我母亲，告诉她我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却一连接到母亲几封来信，不同意我去，甚至她还表示要来上海阻拦我。那时兵荒马乱，怎能让她来呢？许斌章了解我的情况后，也没有通知我，于一九三七年底，去延安。他走后，面对抗战的形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上海成为孤岛，思想上彷徨苦闷，一方面看到租界外日本人占领的地方，中国人通过时要向日本哨兵作九十度鞠躬，稍不注意，就遭到拳打脚踢，过去听到亡国奴悲惨生活的传说，现在竟成为现实，难道我们愿意当亡国奴吗？另一方面，要抗战，不当亡国奴靠谁呢？靠谁来领导呢？靠国民党，他们主张“焦土抗战，长期抗战”，但拿不出什么真正切实有效的主张和办法。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些在当时的报纸和

刊物上广为转载),却讲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很有说服力。接着,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的消息传来,令人欢欣鼓舞,使人们有了希望,有了办法,增强最后胜利的信心。接着,斯诺著的《西行漫记》出版,用生动语言,形象化地介绍共产党、八路军和他们的主张。我买了这本书,反复阅读,曾经模糊的意识和混沌的思想顿时清醒起来,对国民党的那些反动宣传从此不再相信。一九三八年,二伯父夏奇峰当了汉奸,对自己的思想震动很大。反复考虑,下定决心:一是,他当汉奸,我决不当;从历史上看,忠于国家、民族与出卖祖国、出卖民族之间泾渭分明,我决不能成为千古罪人。二是,投奔共产党,经过许斌章向我讲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知识,《西行漫记》中的形象化的阐述,让我对于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他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劳动大众的利益,当今穷人只有革命,推翻剥削阶级,求得人类的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当前首要的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当时,我们党利用抗战中民族在觉醒、人民求进步的大好形势,利用租界的特定条件,大量出版马列主义书籍,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我先后买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反复看,看不懂就记个大意。三是,“抗战”依靠谁来领导?由蒋介石吗?他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不是军队的官长和士兵不能打仗,而是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错误指挥,导致节节败退。而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

策,“持久战”和“新阶段”等理论,则为国人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和争取胜利的方针、办法。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投奔共产党,投奔新四军。那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投奔延安,沿途往往要经过多层封锁,困难很大,到新四军则比较方便。至于去新四军告不告诉我母亲,我考虑再三,决心不告诉了。在社会大变动中,在历史上是忠孝不能两全的。下决心去新四军后,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冯逸之是一个。他常来报社投稿,写些小文章,登在报纸的副刊。尔后相互介绍又结识了陶祖全、翟惟立等七人,准备一齐瞒着家庭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介绍我们去呢?冯逸之说,有个可靠的朋友,可以写信给在浙江金华的三联书店负责人骆耕漠,由他介绍我们去新四军。三联书店是个进步书店,上海卖的马列主义书籍都是这个书店出版的;骆耕漠是经济学家,常在报纸上写文章宣传抗战。我听后认为这个关系可靠,可以走他的路子去新四军。走之前,我向报社经理蒋光堂说,我要参加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他积极支持我的行为。他说,你去找总编恽逸群,他有办法。可能蒋光堂事先已告诉了恽逸群,所以,夜里他来报社后,热情接待我,鼓励我。他说:“大革命时,在上海我认识新四军负责人项英,相隔十几年,他一时可能记不得我了,我替你写信给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冯定,他的笔名叫贝叶,我与他很熟悉。”说着,就写了一张便条——贝叶兄,我的朋友夏光亚等,想到你那做些小买卖,望接洽。

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恽逸群是位老党员,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我们七个人从上海乘船到宁波,转乘汽车到兰溪,住在一个小旅店内。冯逸之去金华三联书店找到了骆耕漠同志,骆又写了去新四军的介绍信,因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用辞都很隐晦。骆告诉我们,去岩寺新四军兵站要经过一座小桥,桥西是新四军兵站,桥东有国民党军队哨兵,盘查来往行人,特别是对青年盘查很紧,不准青年学生去新四军,“你们要分批走,减小目标,如遇到盘查可说在上海学生意,打仗啦,去投奔亲戚等等。”骆耕漠叮嘱说。

晚上,在兰溪小旅店警察查房,我说我在上海学生意,打仗啦,关店了,到乡下亲戚家;说我们几个是在船上、汽车上相识,为了节省钱住在一起。警察搜我们东西,又找不到可疑之处。看他们还要啰嗦,冯逸之老练地拿出两块大洋,塞在警察手中说:请老总买点烟抽抽。警察扬长而去。

第二天早上,乘汽车去岩寺车站,按照骆耕漠嘱咐,分批过桥,同时也准备对付警察的办法,并抽定人准备塞钱。结果,很顺利地到了岩寺的兵站。

我们说明了来意,把两封介绍信交给兵站负责人,他非常热情,说,你们先休息几天,我们报告军部,等待答复后通知你们。并告诉我们不要乱跑,“特别不要到桥东那边,他们对我们看得紧。”

在兵站住下后,我看到墙报和俱乐部的布置,饭堂、

宿舍、厨房和工作人员与勤务员等，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等了几天，兵站负责人通知我们：军部来信，你们明天去中村教导总队报到。我们非常高兴，因为马上就要实现我们盼望很久的愿望了。

第二天，我们七人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一齐乘竹筏去新四军军部，途经村庄，看到“抗战到底”、“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等等标语。中午到达军部，午饭后又派人送到中村军教导总队报到。冯逸之分配任文化教员，我们其余六人到入伍生二队学习。新的生活开始了。

三、入 党

入伍生队，设有队长、副队长，政治指导员、副政治指导员。下辖三个学员排和管理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人左右，设有正、副班长，副班长兼学习组长。管理排有排长，管炊事班。队部有文书，驻队的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军事教育干事、政治教育干事。皖南泾县的祠堂特别多，一个队驻一个祠堂，进门两侧的房间，为正副队长和正副指导员的宿舍兼办公室。祠堂正厅，两侧各住一个排，冬天用稻草帘隔开防寒，后面是教员、教育干事和管理排长、炊事班宿舍，另有厨房。军事课是游击战术，

班排进攻和防御、射击、投弹、土工作业、制式教练等，政治教育是社会发展史、持久战、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等。制式教练的军事教员大都是抗战失散的国民党军官中思想比较进步者担任。白天操课、晚上讨论。教育干事在教员讲课后进行辅导。我们队里设有俱乐部，下有学习、墙报、文娱、经济、青年等委员。主任、副主任、各委员由军人大会选举产生，副指导员对它的工作具体指导，每月或重大节日出墙报，每月开问答晚会，每月公布经济账目，发扬经济民主，改善伙食。每天九分钱伙食费，每月吃两次肉外，还略有节余。一个月一块钱津贴费。共产党支部，党的活动是秘密的，有青年队，由副指导员领导，青年队长由党支部青年委员兼任，副队长、组长由选举产生。每周教唱歌两三次，每餐前唱歌，开晚会唱歌，唱革命歌曲也是生动的政治教育。唱流亡三步曲，想到抗战时流亡的痛苦，心中油然而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唱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唱得我们热血沸腾；毕业歌词中“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好像我们即将慷慨激昂奔赴战场……当时，一些进步的音乐家如何士德、任光、安娥等在军部开晚会上常见到，他们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火热的斗争，所以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

军部每周开一两次晚会，会前相互拉唱歌，不是比赛的比赛，谁唱得好一听就清楚。在晚会上听首长讲话，开阔了视野。总之，政治空气很浓，发扬了民主，生活上过得很充实。三个月很快过去，入伍生二队的学员生活结

束,我调到四队继续学习。四队是政治队,学员主要是知识青年,驻队教员罗琼,是训练处长薛暮桥的爱人,讲课很生动,课程增加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他课程与入伍二队一样。我们一起从上海来的陶祖全、翟惟立、王佳良和我等四人调入四队继续学习,冯逸之仍任文化教员,郑、唐两人分配了工作。

经过学习,认识不断提高,我要求入党的愿望与日俱增,我们班里同学陈德荣不断找我谈话,告知关于党的知识。我一再表示入党要求,他指出我的优缺点,今后努力方向,不久,驻队教员罗琼找我谈话,问我家庭情况,我一一回答,交待二伯父夏奇峰当汉奸一事,我又提出加入共产党要求,罗琼同志又找我谈话,讲入党的条件,指出我今后的努力方向。约两周后,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组织于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批准了我入党,介绍人是陈履仁、罗辅庭两位,候补期三个月。陈履仁、罗辅庭同志毕业后分配前方工作,罗一直没有联系,陈履仁同志于一九四二年任营教导员战斗负伤,我在师后方医院任总支部书记,在病房中相见,畅谈别后的各自情况,以后一直保持联系,我向他学习不少东西。他于二〇〇一年患肝癌去世。入党后,我经常看到油印的党课材料,给我印象深的大意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一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抗战的目的是要继续维护它的统治,把中国引向黑暗;另一个则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和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共产党,要

把革命进行到底，把中国引向光明。

入党后，约一个月调三队任政治教育干事，这个队是政治队，学员大多是前方调回的指导员或准备培养的政工干部。十二月底学员毕业，我也提前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尔后我被分配到机炮连任政治教育干事。该队任务是培养重机枪、迫击炮的基层干部，学员来自前方班排，队里配有军事教育干事、政治教育干事各两名。一九四〇年夏调教导总队队务处队列科任干事。科长张仰是二支队作战科长，张仰对同志很热情，工作很认真。

教导总队的组成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教导总队队长，教育长冯达飞，经历过长征，在苏联学习过。机关有队务处，处长张元寿同志是位红军，调走后朱毅同志接任。朱毅是地下党员，任过国民党的县长。队务处下设队列科、军需科、财务科、门诊部。训练处，处长薛暮桥，副处长王太然。处长负责政治、文化教育。夏征农、陶白、袁牧华、罗琼等政治教员都是地下党员，主任文化教员汪溪是清华大学学生；王太然负责军事教研室。在有些队派有驻队政治教员，对各队派有军事、政治的教育干事。政治处主任余立金是经历过长征的，下辖组织科科长邱一涵、宣传科科长张崇文；特派员先后有丁公量、张雍根，俱乐部主任毛中玉。总队部机构人员很少，驻在泾县中村。中村前面有一条山溪，半月形，从西南流向东南方向，沿小溪按次是一、二、三、四、五队；南洋归国华侨抗战中组织的军乐队，机炮连，工兵连；向东北方向是一